

新时代我国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选择

——自由的市场经济 VS 协调的市场经济

金英姬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100007)

内容摘要：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 20 世纪以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两个相互冲突的重要经济理论。相对应地，依靠市场调节还是政府干预成为了争论不休的主题。市场和政府对经济活动有着不同的功能，其重要性随着上述两个理论的交替登场而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局面。人类的经济实践活动形成了政府计划和市场调节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历史事实表明，这两种方式的选择与社会制度或经济发达程度并无绝对的相关性。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具有较高的效率，而政府的干预和协调可以作为对市场失灵的补充和完善。本文根据经济活动的不同层面和不同效果分析了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劣，认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即协调的市场经济而非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福祉和国家安全最有利的发展方式和发展体制。

关键词：发展方式 经济理论 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主义 有效市场 有为政府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21)09-028

DOI:10.19626/j.cnki.cn31-1163/f.2021.09.003

一、问题的提出

经历 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各界掀起了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及对相关经济理论的批评，相应国家也适时做出调整或快或慢走出危机，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经济秩序。每次重大危机都成了学界对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和相关理论进行反思或批判的契机，甚至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体制和发展方式的重要转折点。这些反思和批评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处于危机泥潭之中的发达国家也一样激烈。“美式资本主义深陷迷途，只有全面还原真相，重建政治与经济制度，才可能开启美国未来之路。”^①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2020) 的专著《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中文版封面中的一段话。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选择最合适的经济发展体制和发展方式来迎接当前和未来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各种风险、挑战和冲突，保持稳定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世界所关注的问题。

在 2021 年 1 月 11 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开班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了三个“新发

收稿日期：2021-8-4

作者简介：金英姬(1968—)，女，黑龙江牡丹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亚太经济。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①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著，刘斌、刘一鸣、刘嘉牧译：《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年 11 月出版。

展”：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我国目前已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秉持“新发展理念”这一指导原则，通过选择最佳的现代化体制来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符合新形势和国家发展战略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体制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在更加不稳定和不确定的环境中谋求我国健康可持续发展，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三个“新”：科技创新（壮大发展新动能）、产业创新（促进新兴产业形成新的增长点）、格局创新（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① 在三个创新的问题上，“谁”成为主角和引导者（依靠市场调节还是政府干预，或者说采取“小政府”体制还是“大政府”体制，或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协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相互冲突且多次反复的议题再次浮现出来。

从最近的现实情况来看，2019年底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危及全世界，严重冲击了各国经济，无数工厂和店铺倒闭关门，失业率急剧上升，尤其是娱乐、餐饮、旅游等需要人员聚集的行业遭到重创，经济活动时不时要暂停，一些国家陷入混乱无序和撕裂。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和认知，新冠疫情可能会长期化、常态化。经过一年多的抗疫实践，可以看到在多了新冠疫情这一新的变量之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已经不仅仅局限在生产—消费、投入—产出这种过去主要集中在市场活动的范畴。加上近期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力量对比和秩序出现重大变化，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经济保护主义徒增，单边主义加强，经济领域的冲突和摩擦不断升级，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严重干扰和影响了经济的正常运转。这些重大变化带来的巨大破坏和各国的不同表现，世人自有目共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梳理和反思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道路及其相关理论，选择最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体制，有效配置和利用各种资源，使其能够带来企业利润和社会利益，确保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提高人民福祉，维护国家安全。一国的发展体制和发展方式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在目前复杂而急剧变化的现实情况下，对国家经济发展方式和体制的探索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本文通过文献回顾梳理和对比了长期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两个相互冲突的经济理论，在基于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下探讨了面对各种不同的利益是采取市场调节还是政府干预，以及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协调的市场经济体制两者中如何做出选择。这对我国面临世界大变局，选择最有效的现代化发展体制和发展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支持意义和现实参考作用。

二、文献回顾

本节通过文献回顾重点梳理经济发展过程中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演变以及政府和市场角色的变迁。经济理论试图阐述经济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或者应该怎样运作。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思想理论或一脉相承或颠覆重建。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强调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以及劳动分工，他让经济理论的发展登上巅峰，其理论也成为社会理论中的经典之作。到了近代，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二人对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法西斯主义独裁、经济大萧条的恐慌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对抗后的20世纪经济和社会思想的两大分野作出了最好的阐述，二人的理论被当今世人奉为经典。凯恩斯通过货币与财政

^① “面对世界经济复杂局面 习近平提出三个‘新’”，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2005/25/t20200525_34973821.shtml

政策将重点放在了政府监管上,相反哈耶克出于对中央计划引发的专制主义的谨慎与忧虑形成了与凯恩斯不同的经济思想,他对市场经济理论、市场机制的运行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信奉自由主义,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托马斯·霍伯(2020)^①认为哈耶克和凯恩斯的主张是自由与计划两大派别的思想的巅峰对决。不管二人或两大派别的主张怎样地大相径庭,以哈耶克和凯恩斯为代表的两大学派在各自不同的时期都尝试提供解决经济问题的良方。

经济发展历程成为了经济理论的发展历史,而经济理论也反映了当时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解决的处方。从哈耶克和凯恩斯的主张中可以看出,所谓自由和计划实际上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还是政府成为主角和引导者的问题。

市场力量通常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元素之一。埃伦·米克辛斯·伍德(2016)在其《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在这种制度中,构成生活中最基本需求的产品和服务皆为获利而交换、生产,包括劳动力都是市场中的一种商品,不仅如此,所有的经济主体都依赖于市场。……这一独特的市场依赖性制度意味着竞争与利润最大化成为生活的基本法则。……总之,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目标即是资本的生产和自我扩充。”^②在资本主义的概念界定以及资本主义与其他制度的区别上,伍德强调了市场的力量。那么什么是市场力量。伍德认为:“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市场暗示着自由而非强迫。保证这种自由的是某些确保‘理性经济’得以运转的特定机制。在‘理性经济’中,供给恰好符合需求,待售商品与服务被展出,以便人们自由挑选。上述特定机制便是客观的市场力量。”^③

但是对于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形式的不同之处,伍德也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者需要依赖市场才能获取生产工具,而挪用资产者只能以纯‘经济的’市场机制来进行资产挪用,决不能依赖‘经济以外的’直接强制力量。”^④对东亚国家经济及政治、社会等有所了解的人能看出,东亚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非经济”“非市场”的机制发挥了很大作用,“经济以外的”直接强制力量介入很深,那就是国家意志,或者说政府作用。可见,凯恩斯主张的计划(政府)和哈耶克力推的自由(市场)都对国家的经济运行有着各自不同的作用。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其背后的理论主张,不同时期因当时的环境变化出现了各自的理论需求与角色诉求(参见表 1^⑤)。

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刚刚兴起的重商主义时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处于较低甚至初级发展阶段,市场力量尚未成熟,无法有效调节经济活动,强调政府作用成为了极其自然的选择。在其后的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经济取得了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并逐渐成熟,市场取代了政府的作用。这是古典经济学理论强调自由市场的基石。

即便某一角色在当时的主流经济理论支持下占据上风,其作用在不同发展路径下仍然受各种因素的困扰与掣肘而受限甚至被扭曲。莫妮卡·普拉萨德(2018)在《过剩之地》中以比较的视角检视了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路径。她认为 19 世纪末的美国经济出现爆炸式增长,但美国“到处都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家可归的人”的原因并不是市场的不公平,相反,她指出美国政府干

① [美]托马斯·霍伯:《哈耶克舌战凯恩斯:思想的巅峰对决》,北京:新华出版社,2020 年 2 月出版。

② [加]埃伦·米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著,夏璐译:《资本主义的起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0 月出版,第 2 页。

③ [加]埃伦·米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著,夏璐译:《资本主义的起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0 月出版,第 4~5 页。

④ [加]埃伦·米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著,夏璐译:《资本主义的起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 10 月出版,第 2 页。

⑤ 作者根据以下资料整理:黎冯梅:《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阐述的研究综述》,载《全国流通经济》2019 年第 18 期,第 53~55 页;武文菲、范明英:《政府与市场的嬗变关系研究——以西欧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为例》,载《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5 年第 5 期,第 64~66 页。

预不仅由来已久且非常强大,那些认为“美国政治经济体制是以最小化的政府干预为特征,强调市场经济的差异性,美国是一个‘自由主义的’(Liberal)或‘放任主义的’(Laissez-faire)国家,不信任政府干预而热衷于自由市场”的观点只是神话。普拉萨德提出政治经济学的“需求侧”理论,指出以信贷和消费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长远弊端,当时依赖信贷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为美国带来了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埋下了危险的种子,造成了当时经济高速增长与大量人口贫困的悖论。^① 在古典自由主义盛行时期,这一现象也显示了市场作用的局限与弊端。

表 1 关于政府与市场作用的理论演变过程

主导理论	重商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	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主义
年代	15 到 18 世纪中期	18 世纪 60 年代起	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	20 世纪 70 年代
背景	资产阶级初步萌芽,但经济力量较弱,市场机制也不完善,难以自我调节,而政府拥有强大的能力培育和推进市场。	18 世纪西欧大规模进行产业大革命,主要国家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相应地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干预成为市场的桎梏。	1929 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市场自我调节机制的弊端,市场严重失灵,使得西欧国家对市场万能论的盲目崇拜受到巨大冲击。	1974~1975 年再次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政府难以承受过多的福利负担,主动削减经济职能,将经济支配权还给了市场。
核心主张	国家全面干预	国家不干预,政府应该对市场经济活动放任自由	市场并非万能,国家应积极干预	限制政府的干预,倡导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实行私有化、唯市场化和唯自由化
要点	“强政府”与“弱市场”	“守夜人(政府)”与“绝对主角(市场)”	国家全面干预与市场微观调控	政府卸载退出与市场重新回归
代表学者		亚当·斯密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米尔顿·弗里德曼 詹姆斯·麦基尔·布坎南

撒切尔(1979 年)和里根(1981 年)上台后分别对英国和美国的经济结构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从而影响了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思维革命,通过实行“大市场、小政府、轻赋税”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解决了西方国家在经历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的滞胀局面。这种新自由主义路线上升为“华盛顿共识”,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全世界推销,一时间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奉为圭臬的典范。

结果不到 20 年,亚洲地区发生了外汇危机引起的经济崩溃。1997 年底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亚洲国家的发展方式受到了高度质疑,并为亚洲国家审视和反省过去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契机。有趣的是,对于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一些人指责是因为政府干预过多,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市场失灵所致。

作为资本主义核心要素的市场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领域都存在失灵现象。日本学者伊藤诚(1999)指出,1997 年底开始亚洲国家经历的一系列货币和金融危机,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破坏性和不稳定性的再一次呈现。80 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亚洲地区备受推崇,各国开放市场,再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大潮、金融和资本交易的自由化,导致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激增,使亚洲国家吸收了大量投机资金,造成了 90 年代的泡沫及其崩溃的后果。这就是 1997 年亚洲国家爆发一系列金融、经济危机的背景。因此,不少人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市场失控失灵的结果和新自由主义失败的标志。那么,如何寻找新自由主义的替代物。当时学术界不少人主张向凯恩斯主义复归,以此作为改变经济萧条的出路。^②

^① [美]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著,余晖译:《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 11 月出版。

^② [日]伊藤诚:《全球化当中的日本资本主义》,载《理论视野》1999 年第 4 期,第 51 页。

十年后,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危机自 2007 年 8 月(一般被称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对全球经济形成了巨大冲击。这为人们重新分析和塑造经济制度打开了空间,并激起了新的理论需求。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在各界引发了与西方资本主义相关的对各种问题的再反思。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陷入超出预期的较长时间衰退之中,高失业率和日益加深的财富收入的不平等,使得人们对当时经济学的主流——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占据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发出了挑战。尤其引人关注的是,持异议的两大经济学派重启了它们的批判,并且再次提出了它们的替代方案。第一种持异议者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即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现于英国的经济理论。第二种持异议者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抨击的经济学派,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卡尔·马克思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分析,但又使之呈现出非常不同于两人的思想方向。凯恩斯主义再次回潮且变得更加强势。这一派学者们认为,十年来两场大危机的爆发证明了纯粹由市场左右的而不受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失败,国家可以也应当管理资本主义经济。

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乃至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之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20)猛烈抨击了西方经典经济学。他深刻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弊端,包括管理不善的全球化 and 掠夺性的金融化等,展示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即一步步造成当前美国的产业空心化、贫富差距悬殊、政治立场大分裂等。他认为,美国在迷信市场经济的错误道路上已经迷失了太远,仅仅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做出细微的调整已经无法弥补过去遗留下来的漏洞,也无法解决目前美国千疮百孔的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一个新的社会契约亟待建立才能让美国焕发生机。他指出,“让市场来决定一切”的口号从来就没有任何意义,要发挥政府作用,减少对市场的过分依赖,加大政府的监管作用,政府在为市场提供规则和监管之外还深度参与技术进步等公共产品的提供,因此能够对修正市场失灵做出贡献。斯蒂格利茨在书中多维度深刻揭示了美国当今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深层次根源,批驳了自由放任经济政策。认识市场的危害性,恢复政府的治理能力,这是斯蒂格利茨《美国真相》的精髓。^①

保罗·马蒂克(2019)认为,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历史逻辑发展的产物,它实际上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就已经露出端倪,只不过当时被政府的经济政策所遏制。他指出,私人企业赚取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冲动是全球危机的根源,现行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恰恰屈从于这种冲动,资本主义无法创造出足够的利润来将全球人口纳入到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体系,而人们在讨论未来经济的发展时却忽视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各国政府在经济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②

即使是以自由市场为导向的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元老——理查德·波斯纳(2009)也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探讨着手分析了 2008 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这位自由市场的坚定拥趸指出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及核心机制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失败导致了美国和全球的这场经济萧条,他对政府对这场危机负有基本责任的说法表示怀疑,指出这场萧条是自由放任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结果,是自由市场放任资本逐利行为的结果。他揭露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瑕疵,预言资本主义只能以折中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并指出在遏制和翻转经济衰退方面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比美国更

^①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著,刘斌、刘一鸣、刘嘉牧译:《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的失衡与再平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年 11 月出版。

^② [英]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 Jr.)著,魏佳妮、刘清山译:《资本主义的冬天——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失败》,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9 年 5 月出版。

迅速地取得了成效。^①

迪梅尼尔和莱维(2015)在《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一书中探讨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背景下所发生的 2007~2010 年的“大衰退”(即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两位作者采用大量数据全面而客观地剖析了新自由主义盛行以来的数十年里世界主要国家(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非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和逻辑以及导致各不同阶段危机的因素和根本原因。作者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阶段,相应地,新自由主义危机这一概念也暗示着资本主义发展有可能转向一个新阶段。……国际新自由主义的秩序——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被强加于全世界,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扩散到欠发达的外围国家,经常是以严重的危机为代价的”。作者尖锐地指出,新自由主义见证了一个基于很成问题的实践之上的脆弱而臃肿的金融结构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形成并成为“产生虚拟盈余的”幻景,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将这一幻景打回原形。他们认为,解决一系列矛盾(包括不可持续的脆弱的金融结构和美国经济的发展轨迹)所需要的一种新社会秩序的构建,是与美国霸权下的新自由主义特有的阶级野心互相冲突的。作者们还客观分析和评价了中国道路,认为区别于英美新自由主义的中国道路通过其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了对新自由主义极有说服力的挑战。^②

之后,这两位经济学家又针对欧盟的具体情况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最新情况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理论研究,揭示出欧盟、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未能尽快走出危机状态的根本原因,明确指出美国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正在走向终结。^③

可见,每一次剧烈的社会变化(或产业大革命或全球性经济危机)都成为了一个理论质疑并颠覆当时的主流理论、提出新药方并塑造新的经济制度的契机。在漫长的经济发展时期,政府和市场两个角色交替登场,各领风骚数百年或数十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与市场作用的重要性从两极分化逐渐向中间靠拢,即从重商主义时期和古典自由主义时期着重强调由政府全面干预或由市场自由调节的极端化走向凯恩斯主义时期的政府介入和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大市场、小政府”,以及新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和市场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两个主导力量不是非此即彼,此消彼长,而是两个角色重要度位置有所不同(见图 1)。

政府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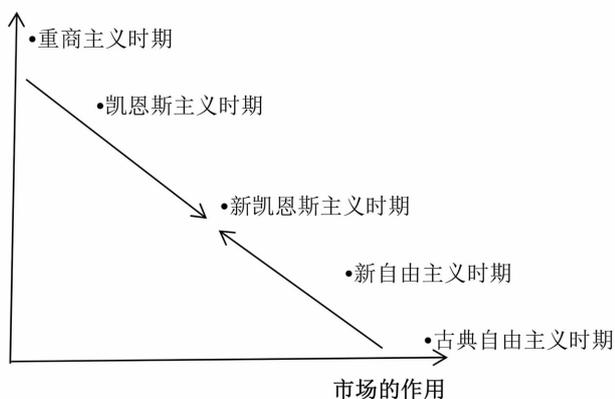


图 1 关于政府与市场角色的重要度变化

① [美]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著,沈明译:《资本主义的失败—零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

② [法]热拉尔·迪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法]多米尼克·莱维(Dominique Lévy):《新自由主义的危机》,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5年8月出版。

③ [法]热拉尔·迪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法]多米尼克·莱维(Dominique Lévy):《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5年8月出版。

理论源于现实,也必须适应现实、服务现实。从相互冲突的两大理论内涵来看,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介入和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调节有着理论诞生的现实状况与社会环境,在不同时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两个理论以及它们所倡导的政府和市场这两个角色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和效果。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强调一个理论和一个角色显然难免偏颇,两者有机结合取长补短才是最合适、最有效的。

三、协调的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经济增长的要素主要包括原材料、劳动和机器设备(也称之为实物资本)、技术革新等,也可以概括为人、财(资本)、物(原材料、设备等)。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2016)指出,经济学家们一般都集中关注两种增长的源泉:①要素投入的增加(资本和劳动),②创新和技术革新。这两种增长方式分别可以简称为依靠“蛮力”的增长和依靠“精明”的增长。^①不管是哪种增长,如何对资源进行有效、高效、最佳的配置是经济活动参与者共同关注的问题。

人类长期的经济实践活动形成了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一种是政府计划方式,另一种是市场调节方式。现实中,包括原材料和资本在内的资源并不是充分的,很多资源具有稀缺性。从这些资源的可获得性和有效配置来说,通过市场调节还是通过政府协调就成了重要的选择。那么,这一选择和什么因素有关呢?

(一)与社会制度有关?

二战结束后,世界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实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在那个物资和资源极其匮乏、百废待兴的年代,由政府主导、统筹规划、协调和分配的计划经济获得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效。而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则通过市场经济体制也取得了长足的经济的发展。

但是,1989年开始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使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改变,社会主义似乎成了走不通的死胡同,而资本主义制度被一些人认为是人类最完善的制度。

其实,保罗·马蒂克(2019)指出,“资本主义”一词在学术上可以是中性词,它更多指的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方式的经济体制。因此,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资本主义”一般等同于“市场经济”。^②市场机制主要包括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争机制,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不仅能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还能推动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是自由市场主义者的观点,也流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市场能起更好的自我调节和资源配置作用吗?市场之所以能够进行资源配置并且以最低成本取得最大利益,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关资源配置和生产的决策是以投入和产出的计算为基础、以营利为宗旨、生产者、消费者、工人和生产要素所有者在市场活动中形成的。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基本特质是,所有的企业从事生产活动都是为了利润,只是为了利润。这种特质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点。

鲍莫尔、利坦和施拉姆(2016)把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分为四类:①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②寡头型资本主义、③大企业型资本主义、④企业家型资本主义。^③从这个分类中可以看出,在现

① 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著,刘卫、张春霖译:《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6月第二版。

② [英]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 Jr.)著,魏佳妮、刘清山译:《资本主义的冬天—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失败》,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

③ 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著,刘卫、张春霖译:《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6月第二版。

实的经济活动中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完全排斥国家(政府)的主导作用,相反,二战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因为实行了国家(政府)导向型发展战略,经济才得以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发展。而且,二战后由于“小政府”资本主义遇到大萧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转向了“大政府”方式,政府的作用得以提升。即便在资本主义的代表性国家——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当时无序又无效的经济进行管理,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方式大大缓解了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取得了良好的成效(1933年罗斯福新政)。况且,目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中仍有20%左右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它们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公有制经济都深刻地烙上了政府的意志、行为和权力的印痕。”^①因此可以说,在选择市场调节或政府干预的方式发展经济的问题上社会制度并不是决定因素。东欧剧变之后中国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表明,市场调节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专利,政府干预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独有手段。

(二)与经济发达程度有关?

从重商主义过渡到古典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发达程度似乎与是依靠市场还是依靠政府来配置资源的选择有关。在前面的文献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二者的重要度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剪刀差,即,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市场越成熟,市场的资源配置和自我调节能力越强,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节作用相对趋弱(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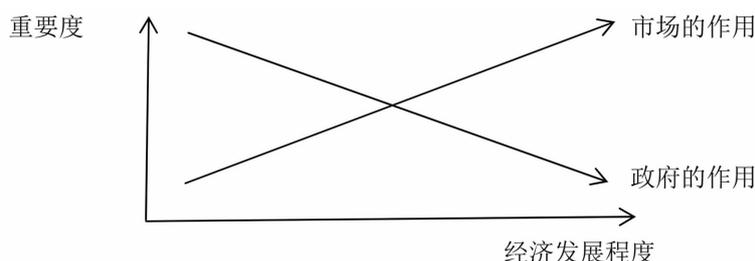


图2 经济发展程度与政府、市场的作用

而在发达国家屡次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表明,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即,市场能否发挥更好的自我调节作用和资源配置效果(注意是“效果”而非“能力”)与经济发达程度并不一定成正比。

有效市场假说是近40年来金融学理论的核心命题。但是,正如安德瑞·史莱佛(2015)指出,在这个假设中,“投资者都是理性的”以及“套利的作用能完全实现”这两种假定严重违背了心理学规律,在基本原理上也是行不通的。^②因此,安德瑞·史莱佛用行为金融理论分析方法提出了非有效市场的观点,这是他在1999年获得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的主要贡献之一。安德瑞·史莱佛的非有效市场局限于金融领域,但从他的噪音交易、专业套利、投资者心态、反应不足、反应过度等研究方法可以推论,非有效市场同样适用于所有经济领域。人类的认知能力有局限,信息严重不对称,还会延迟,激励机制会扭曲,人性中的欲望等会使市场在进行资源配置时失灵,非有效市场才是常态。

匈牙利裔英国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又译“巨变”)中认为,在“自我规范的市场”这样一个想法(假设)中隐含着明显的乌托邦。由此可以引申,市场失败或者说市场失灵不是一时

^① 李正图、张凯:《论公有制经济中的政府行为》,载《江淮论坛》2016年第2期。

^② 安德瑞·史莱佛(Andrei Shleifer)著,赵英军译校:《并非有效的市场——行为金融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11月第一次出版。

的(或暂时的)现象,而是注定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过度迷信市场万能,这将产生严重的后果。纵观经济发展历史,因为人们对财富的狂热追求、理性的丧失、羊群效应等市场现象和资本的逐利本能,只要存在资本流动,在每一个市场经济总会不断涌现泡沫,而且这些资本的投机标的所涉及范围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比如 17 世纪荷兰的郁金香泡沫、1984~1985 年期间中国长春的君子兰泡沫、以及五花八门的金银矿藏和收藏品等等不一而足。

市场的自我调节和资源配置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完善,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日益增强。问题是,能力越强破坏力也越大。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现在,市场空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几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保罗·马蒂克(2019)指出了—个事实,那就是以自由市场为基石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周期性发生危机的。比如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1981 年的经济衰退、1997 年底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7 年底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① 总之,市场调节或政府干预与经济发达程度并不构成决定性相关关系。

(三)自由的市场经济还是协调的市场经济:哪个最有效?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将市场的作用比喻为“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单靠市场就能完全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在实现个体利益的同时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但是实践证明,无论在欧美还是亚洲,完全竞争的市场体制是不存在的,市场存在固有缺陷,市场也会失灵。这为政府的介入提供了必然性和合理性。自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危机后,政府全面干预市场的理论成为主流,以帮助国家度过难关。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凯恩斯主义无力解决“滞胀”问题,理论界出现了要复归自由主义的思潮。随着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向全世界蔓延,人们认识到片面强调市场作用的自由放任方式有局限性。

那么,市场和政府,到底哪个是资源配置的最佳执行者。如何更好地、更有效地分配有限的(甚至是稀缺的)资源,使经济能够稳定健康地发展,这是我们需要探讨和关注的重点。如上所述,选择市场调节或政府干预与社会制度、经济发达程度并不完全相关,这是选择自由的市场经济还是协调的市场经济的问题。

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毋庸赘述。作为对市场失灵的完善和补充,政府的作用多次登上历史舞台和经济学理论的中心。但更多的时候,政府的作用局限于制订经济政策(包括财政、金融、税务、进出口、外汇管制等)、完善经济制度等(奖励、鼓励、便利化等)宏观经济领域。从宏观角度看,经济的“燃料”是政府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使通货膨胀保持低水平,让经济相对稳定运行,防止经济下滑(或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中断长期增长的进程。^②

那么,政府能否像市场一样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中呢?威廉·H·詹韦(2017)指出,市场失灵使国家干预合法化,而且市场难以分配足够多的资源给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这也是市场失败的典型例子,市场无法保证充分供给是国家干预的根本原因。通过对过去 250 年历史的回顾和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总结,他提出了“三方玩家游戏”的概念,“三方”即政治(政府)、经济(市场)和金融力量(资本),指出这个游戏中任何一个玩家都没有能力单独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或难以预测的可能发生的危机,三方必须协调合作并集体行动,才能确保经济正常运行,并认为经济创新是由政府、市场和金融资本三者之间不断相互影响、相互依存而驱动的。^③

① [英]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 Jr.)著,魏佳妮、刘清山译:《资本主义的冬天—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失败》,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9 年 5 月出版。

② 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著,刘卫、张春霖译:《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年 6 月第二版。

③ 威廉·H·詹韦(William H. Janeway)著,俞林伟译:《资本“主义”—市场、投机和政府如何推动创新经济发展?》,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年 6 月出版。

彼得·埃文斯和迪特里希·鲁施迈耶等在他们的论文集《找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中指出,有效的国家干预是资本主义成功发展的必要组成部分。有充分的理论依据表明,一旦市场竞争出现危机,或者资本主义经济要维持资本积累并达到高水平的生产力,国家干预是必要的。^①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作用不应局限于弥补市场失灵和危机发生之后亡羊补牢式的补救,而是未雨绸缪的事前规划、引导和介入。市场能够分配资源劳动和资本,与此相对应地,政府应该干预并规范市场行为,在有些领域、有些时候甚至主导、控制,以减轻无序的市场行为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况且,任何国家的资源都不是无穷无尽的,相反,很多资源都具有稀缺性。政府必须着眼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向那些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产业优先分配资源。即便在微观的企业活动中也需要政府来帮助克服资源的外部性和市场协调问题。而市场的缺陷,比如大量假冒伪劣产品的存在,更加说明政府的干预和规范是必不可少的。

对于政府的行为,从理论上讲,国家既有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又有将资源用于经济发展的意愿。根据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的利益集团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国家可以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奥尔森认为集团是“一些拥有共同利益的人”,尽管他以个人主义方法论批判了传统的集团理论,但根据“集团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利益是集团行为的重要取向”这一内涵,国家就是拥有共同利益的集体。而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市场失灵(奥尔森强调理性而自利的“经济人”会在集体行动中搭便车,从而使集体行动陷入困境)有关。政府是国家这一共同利益集体的具体体现和实施者。因此可以说,国家意志下的政府的强力主导和积极干预是对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很好的演绎。

重要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有很多超越经济因素的其他考量,比如,国家安全、国家发展和防控疾病,这些都是政府干预的客观要求。在现实生活中,这些看似非经济的领域根本无法与经济脱钩,这就更加需要政府事前以及事后的规划、扶持及干预。在这个世界上,与人们的工作、消费、储蓄、投资等一切活动有关的事情都是由政府、市场等玩家构成的,缺一不可。^②历史经验表明,简单迷信市场机制或一味依靠政府功能,都不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优制度安排,必须遵循效率和公平兼顾的发展方式。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关系格局发生变化,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单边主义和经济保护主义加剧,全球化和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新冠病毒疫情长期化、常态化甚至有可能会反复并不时会恶化。在这种新情况下,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需要重新思考经济发展方式,以图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从经济活动本身来看,有微观和宏观之分;从经济活动结果来看,有效率和公平之分;从经济活动成果来看,有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分,有现实利益和战略利益之分。综合两种资源配置的优势来看,市场调节有利于微观经济活动,政府干预更适合宏观经济活动,这是市场和政府两个要素的不同功能和定位决定的。而冷战结束前两个不同体制的长期实践证明,由市场机制来进行资源配置效率会高,但是有损公平;而由政府职能来进行资源配置,效率会相对低下,但是会公平。在效率和公平方面,很多国家都有经验教训,比如根据市场调节体制自然形成的工业区和非工业区、经济中心和边缘地带,带来了地区发展不均衡、产业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这些不均衡需要政府来协调和组织,甚至直接投资和介入,以利于国家的均衡发展和社会的公

^① [美]埃文斯、鲁施迈耶、斯考克波编著,方力维等译:《找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4月出版。

^② 威廉·H·詹韦(William H. Janeway)著,俞林伟译:《资本“主义”—市场、投机和政府如何推动创新经济发展?》,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

平和谐。

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目的来看,追求利润是终极目标。在经济活动中,对企业或个体参与者有利的决策可能对社会不利,无法创造社会利益,甚至与社会利益相抵触。尤其是企业试图降低生产成本以提高利润,这种决策是理性的。但对社会来说,降低劳动力成本就会减少劳动者收入,从而导致消费者总和购买率不断降低;而降低其它生产成本,有可能会产生污染环境、偷工减料、质量下降等弊端。因此,在企业利润和社会利益面前,对于前者市场调节显然是最佳选择,而对于后者则需要政府的干预和介入。威廉·H·詹韦指出,那些能够带来经济效果的基础设施网络可由政府来规划、实施和投资(比如美国的州际高速公路),也可以由政府 and 投资者合作来规划、建造和提供资金(比如英国最早的铁路系统)。无论是为基础科学研究提供资金,还是当大量资金堆积的投机泡沫破裂的时候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政府都应该成为中坚力量,以保持市场经济的连续性和活力。^① 这种观点可以理解为政府的资源配置方式更适合为社会利益。比如,在危旧房、棚户区 and 废旧厂房改造等问题上,市场力量明显弱于政府作用。这在欧美的铁锈地带 and 中国的旧区老区换新颜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再比如,当下在资本逐利的目标驱动下野蛮生长的中国课外培训机构,给相关企业和个体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却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教育不公平、学区房疯狂上涨、制造焦虑等种种不利现象。面对企业利润和社会利益的冲突,必须由政府采取坚决而有力的措施,从而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还有,我国现在实行公共租赁住房制度,有利于留住社会发展、经济活动和科技创新所需人才,有利于增进社会福祉和社会稳定。显然这一制度在市场调节的体制下是无法实现的,需要政府的直接介入和干预。

在实现短期利益方面,市场的调节功能基本会奏效,而面对投资大、周期长的长远利益,市场的信息处理、资源投入的速度与广度显然比政府逊色。我国的铁路、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远远超过欧美发达国家,这是政府发挥经济功能所带来的长远利益。从 2019 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应对措施和结果来看,中国政府强有力的“封城”、“一省包一市”、动员全国力量支援武汉、火速建造“火神山”医院 and “雷神山”医院等举措使得中国最快走出疫情阴霾,成为 2020 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2.3%)的主要经济体。这是我国发挥制度优势放弃短期利益、获取长远利益的结果。世界银行曾警告全球贫困人口将因新冠疫情增加 1.5 亿,而我国从 2012 年到 2020 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连续 8 年创造了年均减贫 1000 万人的奇迹,^②即便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在全国肆虐、大部分地区实行隔离和“封城”的严峻形势下,我国的脱贫工作依然有序进行,实现了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8 个人口较少民族全部整族脱贫,832 个贫困县 and 12.8 万个贫困村全部摘帽,整体贫困问题得到解决。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人民的福祉,还有利于增加庞大的贫困人口的收入,极大提高社会的整体购买力和消费能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实现这种社会长远利益,依靠市场的自由调节显然是不可能的任务,必须依靠政府力量,动员多种资源持续推进。

对一国而言,既有现实利益也有战略利益。现实利益可通过市场功能去调动参与者来实现,但是战略利益由于周期长、风险大等原因,需要政府的协调与介入。我国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便是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在政府的统筹规划与企业的参与下正稳步进行。此外,那些战略性资源更需要由政府来牢牢掌控,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去分配,但决不能完全交到市场手中。

综上所述,正确处理好这些不同利益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在资源配置上更适合采取市场调节方式还是政府干预方式(见表 2)。

^① 威廉·H·詹韦(William H. Janeway)著,俞林伟译:《资本“主义”—市场、投机和政府如何推动创新经济发展》,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年 6 月出版。

^② 全世界大约只有 90 个国家人口超过 1000 万,而中国每年减贫人数超过世界一半以上国家的人口数。

表 2 有效资源配置方式的最佳选择

		市场	政府
微观和宏观	微观	√	
	宏观		√
效率和公平	效率	√	
	公平		√
企业利润和社会利益	企业利润	√	
	社会利益		√
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短期利益	√	
	长远利益		√
现实利益和战略利益	现实利益	√	
	战略利益		√

林毅夫根据二战后发展的经验得出,少数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既调动了市场的作用(有效市场),也发挥了政府的职能(有为政府)。有为政府实际上是所有责任的担当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效市场能够做到,但因为选票的考量、利益集团的影响、反对党派的掣肘、党争的撕裂、舆论的压力等,有为政府却很难做到。因此可以说,有效市场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共性,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二者能够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换言之,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二者的结合才有可能实现。

2020 年 11 月底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相辅相成、互为支撑的,缺一不可,以此来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其主要路径就是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三有”经济体制。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和国家治理体制具有中国特色,这也是适合多数发展中国家国情的创新型制度体系和经济发展新理论。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便是协调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能够摒弃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弥补其缺陷,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兼顾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各种不同利益,确保经济健康运行,增进社会福祉,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国家安全。

四、总结、启示和建议

(一)理论总结

自里根时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自由市场的信徒)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然而,著名英籍华裔学者、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发展经济学专家、2003 年纳纳·缪达尔奖和 2005 年华西里·列昂惕夫奖获得者张夏准在其所著的《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 23 个秘密》中对该学派的理论主张背后的假定条件提出质疑。书中张夏准开宗明义地指出根本就没有自由市场这回事,并指出不能让市场决定一切的理由。他罗列了一系列“秘密”,秘密 1:自由市场根本就不存在。每个市场看似自由,但都受一些规则和界限的制约。市场之所以看起来自由,是因为人们完全不在乎市场背后的制约因素,因而对其熟视无睹。市场到底多么“自由”,这是一个政治界定问题,因此很难在客观上界定。自由市场派学者们宣称要捍卫市场自由,防止政府出于政治动机进行干预。但政府常常参与经济活动,而那些自由市场主义者也和其他人一样深受政治动力的影响,因此他们的这种基本主张是错误的。“自由市场”这种说法只不过是神话,破除所谓的“自由市场”是理解资本主义的第一步;“秘密 7:奉行自由市场政策很少会使穷国变富”;“秘密 16:我们还没有聪明到可以让市场决定一切的程度”;“秘密 19:我们一直都是生活在计划经济之中”。张夏准在

本书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运作又是如何失灵的。^①

纵观几百年发展历程中经济制度的选择,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人拥护“计划体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有很多人信奉“市场万能”。中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采取计划经济体制,而后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短时间内实现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腾飞,这也引发了对中国模式的激烈争论。学者当中自由市场派的批评最为激烈和坚定,他们认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扭曲了市场经济理念,妨碍个人的创新和自由,会削弱整个社会福祉,甚至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具有短期性和脆弱性,是拉美化失败的发展模式,远远落后于印度模式等。^②

自由市场派学者认为,政府干预会对市场运行机制造成很大破坏,市场被扭曲,带来严重的寻租腐败、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等社会问题。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7)在《重构美国经济规则》中指出,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学理论发生了根本转变,许多证据向人们呈现了市场的优势和局限。美国创建的是让极少数人受益并扼杀经济长期增长的充满扭曲的市场经济,2008年金融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全球大萧条就是无序的市场经济活动的教训。解决美国积弊的新方法就是制度和修正机构性不平衡,重构制约经济的规则。^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另一本书中指出,美国所谓的“完美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由华尔街金融操控的市场经济。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双料得主、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向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发出挑战,剖析了美式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犀利地指出美国的经济学出错了,人们总是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包括减税和放松管制)是所有经济问题的唯一解,而美国的真相就是民众、政府和市场的失衡。他强调,一个运作良好的社会系统需要在个人主义和集体行动之间取得平衡,政府是最重要的公共产品,政府干预是社会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监管过度,而是监管不足。他指出,与美国的经济制度相反,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被证明十分稳健。^④

全球金融危机后很多人在思考资本主义的替代这一问题。对于“市场的替代性组织”,兰德尔·柯林斯(2015)在《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的未来是“一种非资本主义体系,它意味着社会主义所有制和强大的中央调控和计划”。克雷格·卡尔霍恩也认为,“中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更加有可能”成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形式。^⑤

(二)现实启示

美国学者理查德·沃尔夫和斯蒂芬·雷斯尼克在《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书中比较并检视了当今世界相互竞争的最重要的三大经济理论,指出各理论体系从不同的切入点、不同的逻辑、不同的分析对象、不同的价值体系构建了自己的理论,这些理论仍处于相互争论之中,而个人或群体有意无意中会对这些经济理论做出反应并进行运用,这部分造就了他们的行为。在“我们选择哪一种理论”这一节中,理查德·沃尔夫和斯蒂芬·雷斯尼克指出了几种选择方法:根据结果来选择、基于绝对标准来选择、经验主义的选择、理性主义的选择、根据认识论的选择。^⑥

① [英]张夏准著,孙建中译:《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23个秘密》,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② 王鸿铭、杨光斌:《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与研究》,载《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5期,第21~30页。

③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著,张昕海译:《重构美国经济规则》,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④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著,刘斌、刘一鸣、刘嘉牧译:《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⑤ 嵯明亮译:《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康国与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对话节录》,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5期,第26~29页。

⑥ [美]理查德·沃尔夫、[美]斯蒂芬·雷斯尼克著,孙来斌、王今朝、杨军译:《相互竞争的经济理论: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两大思潮的分歧与论争,成为了贯穿西方主流经济学 240 多年发展演变的主线。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凯恩斯主义的“看得见的手”,到新自由主义“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主张,再到新凯恩斯主义“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的结合”,理论竞争影响着国家的政治生态和经济走向,反过来一个国家的政治条件也影响着某种理论的塑造。大萧条将凯恩斯主义从学术界和政策制定的主导地位中推倒在地,而十多年前全球金融危机又削弱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社会地位。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开启一场经济理论或顽固的辩论、或深刻的反思、或自觉的变化及调整。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突破之一是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各种要素需要通过市场来得到最有效的配置。这是对我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主体力量的反思和调整。但政府不是退出或不作为,而是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在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克服市场的盲目性,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历程和最近二十多年来两次克服严重的大规模金融危机的效果以及在抗击和防控新冠疫情的经验表明,“用市场经济方式促进生产力和发挥政府对市场的规范、辅助和引导的作用”这种二元并行机制,^①即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双管齐下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最富有成效的。尤其在单边主义和经济保护主义加剧,全球化和多边主义面临严峻挑战,新冠疫情不断出现新情况、疫情长期化、防控常态化的新形势下,一定不能忽略政府统筹协调的作用。正如理查德·波斯纳所指出:2008 年的经济萧条就是源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的失败和当时美国政府的不作为。可见,市场有非理性和逐利的自私性,而政府作为集体意志的体现绝不能对经济活动放手不管。各种经济理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支持,梳理不同的经济理论,尤其是相互冲突的经济理论诞生的背景和成效,有助于我们认清经济理论的适应性和时代性,更好地选择当前以及未来能够带来稳定发展的最佳路径。

(三)对策建议

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任何教条的、僵化的、盲目崇拜性的思维都难以建立与现有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新路径,本文回顾、梳理和对比相互冲突又交替主导的经济理论,希望对于我们建立符合时代需求的经济治理体系,提高我们的治理能力提供一些参考。这个时代需要新的思维、新的理论,而这些新思维和新理论需要时间和结果的检验、质询和完善。而对自由市场体制弊端及问题的揭露与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期两次重大经济危机和新冠病毒疫情对每个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各种理论的辩论和碰撞对于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理论探讨和路径选择的重要借鉴意义,有助于中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将各种经济理论的一般原理和核心逻辑运用到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之中。市场是逐利的个体的集合,而政府是利益最大化的集体意志的体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长避短,取长补短”正是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各司其职并有机结合的最佳状态。

每一种经济理论和经济发展道路有其特定的诞生背景和滋长土壤。不管是“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或二者的组合拳疗法还是赞美“市场自我修复的伟大力量”或主张政府发挥更大作用的观点,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毫无疑问,这个世界有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以及价值观、文化传统,“适合的就是最好的”。中国正在走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十九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协调的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根据中国的国情选择的道路。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体制必须根据中国的社会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等客观现实形

^① 陶伟、余金成:《“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载《社会主义研究》2020 年第六期,第 65 页。

成,在实践中总结理论,验证理论,再不断完善发展体制,并使其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特殊价值和与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的普遍价值。在 2021 年 7 月 26 日的中美高层天津会谈中,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时向美方提出三点基本要求,也是中方坚守的三条底线,其中两条就是: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有实力、有能力、也必须走符合国情、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谋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广大人民的福祉。□

参考文献:

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M]. 刘斌,刘一鸣,刘嘉牧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0.
2. “面对世界经济复杂局面 习近平提出三个‘新’”, 中国经济网, [http://www. ce. cn/xwzx/gnsz/szyw/202005/25/t2020052534973821. shtml](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2005/25/t2020052534973821.shtml)
3. 托马斯·霍伯,哈耶克. 舌战凯恩斯:思想的巅峰对决[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20.
4. 埃伦·米克辛斯·伍德. 资本主义的起源[M]. 夏璐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5. 莫妮卡·普拉萨德. 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M]. 余晖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6. 伊藤诚. 全球化当中的日本资本主义[J]. 理论视野,1999(4).
7. 保罗·马蒂克. 资本主义的冬天—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的失败[M]. 魏佳妮,刘清山译.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9.
8. 理查德·波斯纳. 资本主义的失败—零八危机与经济萧条的降临[M]. 沈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 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M].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5.
10. 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 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M]. 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5.
11. 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卡尔·施拉姆,好的资本主义 坏的资本主义[M]. 刘卫,张春霖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12. 安德瑞·史莱佛. 并非有效的市场—行为金融学导论[M]. 赵英军译校.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3. 威廉·H·詹韦. 资本“主义”—市场、投机和政府如何推动创新经济发展?[M]. 俞林伟译.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
14. 埃文斯,鲁施迈耶. 找回国家(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M]. 斯考克波编著. 方力维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15. 张夏准. 资本主义的真相: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 23 个秘密[M]. 孙建中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16. 李正图,张凯. 论公有制经济中的政府行为[J]. 江淮论坛,2016(2).
17. 王鸿铭,杨光斌. 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与研究[J]. 教学与研究,2018(5).
18. 黎冯梅.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阐述的研究综述[J]. 全国流通经济,2019(18).
19. 武文菲,范明英. 政府与市场的嬗变关系研究——以西欧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为例[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5(5).

The Choice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n a Century ——Free Market Economy VS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

JIN Ying-ji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00007)

Abstract: Keynesianism and Neoliberalism are two important conflicting economic theories that have affected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20th century. Correspondingly, whether to rely on market adjustment 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has become the subject of long-term debate. Market and government have different functions o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ir

importance changes with the alternative appearance of the above two theories. Economic practice has formed two resource allocation modes: government planning and market adjustment. Historical facts show that the choice of these two ways has no absolute correlation with social system 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elf-adjustment function of the market has high efficiency, and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coordination can be used as a supplement and improvement to the market failur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levels and effect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wo different resource allocation methods, and holds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efficient market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 that is, 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y rather than free market economy, is the most favorable development mode and development system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ocial stability, people's well-being and national security.

Keywords: Development Mode; Economic Theory; Keynesianism; Neoliberalism; Efficient Market; Effective Government

.....
(上接第 27 页)

Balanc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n Analysis of the Preventive Economic 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ANG Wei YU Xiang-ren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020)

Abstract: President Xi Jinping included balancing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as a crucial part in systematic theory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not only a scientific review over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but also an impro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The coexistence of opportunity and risk coordinates with dialectic laws. In similar sense, the overall plan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reflects the sophistica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response to great changes in new era, also can be called Preventive Economic view. 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diverse risks in five major areas, decide the greatest harm as well as study those risks and unknowns that were ignored by others. In accordance to Xi Jinping's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e should closely integrate practice with theory, explore the basic framework of China's preventive economy, build a scientific theory and important strategy for guiding all kinds of security issues, and open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Risks; Preventive Economic View; Nonlinear Development; Scientific Preventive Economic View